

楞嚴經
如來藏思想研究

苏磊
著

楞嚴經

如來藏思想研究

苏磊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楞严经如来藏思想研究 / 苏磊著. —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
2013. 2

ISBN 978 - 7 - 5161 - 2244 - 0

I. ①楞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大乘—佛经—研究
IV. B942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8588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张 红
责任校对 李 莉
责任印制 戴 宽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: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14.5
插 页 2
字 数 145 千字
定 价 36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电话:010 - 64009791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《楞严经》是一部对中国佛教大乘显密二宗都有巨大影响的经典，从古至今，教界、学界都有很多研究著作，然由于研究者的视角不同，观点不同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争议也很多。

“如来藏”是《楞严经》中贯穿始终的一个中心思想，也是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思想，尤其在大乘佛教中，由于人们对它的不同诠释和理解，引起了许多的争议。近代以来有的佛教学者把如来藏思想判为大乘佛教“第三阶段”的根本特征，甚至认为它背离了佛教的“无我”理论，有“神我”论的倾向，加以严厉地批判。从而又有一部分学者竭力论证《楞严经》是一部“伪经”，否定其经典的、历史的意义。但不管举出多少证据来证明《楞严经》是一部“伪经”，而它长期存在的事实以及它在中国佛教史上巨大影响的事实，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。因此，对《楞严经》，尤其是对其中的“如来藏”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，仍是具有重要学术和实践意义的一件事。



苏磊博士的《〈楞严经〉如来藏思想研究》一书是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。书中对《楞严经》中的“如来藏”概念和思想，结合当前教界、学界所关注的问题，进行了相当深入和细致的研究、梳理，分别讨论了“真常心与如来藏”、“本觉与如来藏”、“显现与如来藏”、“不二与如来藏”等问题，是目前对《楞严经》中“如来藏”思想研究得最为详尽的一部专著，值得一读。

《楞严经》历来也被看作是大乘佛教一部指导修证的经典，书中因此也专门讨论了其中实修的方法和次第，颇有启发。

本书出版在即，苏磊贤契索序于我，于是就简单写了以上几点以为序。

楼宇烈

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

自序

燕园四载，有幸师从楼宇烈先生学习，在聆听着诸位先生的谆谆教诲和与同窗友人的切磋琢磨中悄然而过，凝结的成果，便是这册小书，由我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，其中积淀了自己几年以来的学思收获。

之所以在博士阶段选择以治《楞严经》为基础的研究目标，其中原因在此先做一交代。在过去十余年的传统文化学习求索中，有些经典有缘拜读过多次，在佛学领域，则有《金刚》、《法华》、《楞严》等。近日驾鹤西归的南师怀瑾公，曾在其《楞严大义》中提到佛教所谓“末法”之说，征兆便是“《首楞严经》、《般舟三昧》先化灭去。十二部经寻后复灭，尽不复现。”南师言“愿其不灭，不揣浅陋，欲作此说。馨香祷祝，无尽有情，同登觉阙。”体现出一位以文化传承为使命者的忧患意识和慈悲胸怀。

后来，我亦有幸参访学界方家、教界耆宿，皆言《楞严经》是一部“非常实在”的经典，乃参学佛法的极佳门径。而就佛教学术而言，如果集中在义理方面，则众多



大经只是重点不同，根本意旨上可谓“万善同归”，对提升自身学养均有润益。而且，在收集材料时发现大陆学界尚无针对此经的博士论文及学术专著，那么填补这项空白自是责无旁贷。不过因缘奇妙的是，2011年夏季毕业答辩时，社科院的魏道儒老师说当年包括我在内有三本与《楞严经》研究有关的博士论文参加答辩，实在巧合。在我看来，这正说明当代学人对重点问题、前沿问题的敏感把握，不约而同地选择同一文本进行研究，而进路的不同也使得各自成果展现出不同方面的深刻，这意味着当代学术正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前进，诚如斯，文化幸甚，国家幸甚！

就本人研究的立论理念而言，总体上认为佛教的见地并非纯为理论探讨而施设，而是与拾级而上的修行体证有着密切关系。因此，佛教在两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，建立起针对不同修行类型、不同修行阶段的不同教法，每一教法均是自成体系、各具特色的，彼此之间既相互联系、又有所区别，假如以此一系统的原则去衡定彼一系统的内容，就难免造成争论。

而像《楞严经》的遭遇——在近现代有源出真实性的疑问，其核心思想如来藏也被部分学者指摘为近似梵我之论，至多为不了义的方便说。在我看来，此类批判正是囿于某种学术观点的误读。因此，欲了解如来藏的真实义，必要配合它的修行实践与最能体现其理论特色的经典来观，根据印、汉、藏佛教的一批经论所讲，如来藏实为



从果地立场施设的了义教法，是修持圆顿之道的指导思想和证悟目标。在《楞严经》中，便具体体现为以“本觉”、“显现”和“不二”三个递进的部分来阐释契证入如来藏的过程。首先，本经论述了从心识到本觉——“真心如来藏”的求证路径，以及“真心如来藏”的显现功用之于现象缘起的基础性作用，这两部分分别从“由相入性”和“以性摄相”两个角度说明了如来藏与心物现象之间的关系。进而，本经要求消解掉对“真心”的执着，认为唯有以“妄真不二”的方式证入不可思议的“法界如来藏”——在本书看来是性相融通、法界实相的存在本然，才是究竟的如来境界，亦是佛教追求的终极觉悟。

在本书中我指出，这两种如来藏一是从万法本性而说的基础义，一是从万法本身而说的完整义，对这两种如来藏的区分是本书的最终结论与创构所在。从“真心”出发建立义理，可以讨论如来藏与瑜伽行思想的关系；对于佛教如何理解现象世界也得以深入，本经中万法本“明”的观点与藏传佛教的“心物一元论”有所契合。从“法界”来理解如来藏，则由一切对立皆在双运中相融，使得一切平等、万法如如的实相自然呈现，从而超越义理建构的言说相，消弭了形而上学，在修行实践中证悟中观智慧。而楼师所嘱“《楞严经》具有沟通显密之作用”，也在义理上得到解答，在我看来，所谓的显教、因地教法，是随顺边执凡夫的方便引导，而密教、果地教法是不落二边的实相直陈，《楞严经》言赅顿渐、摄果含因，可谓通



于显密。

本书大旨，无外于斯，包含着我对佛教修学体系的整体理解与把握，囿于精力与篇幅所限，成稿仅十余万字，部分章节于相关佛学资料的铺陈略显不足。此中有任何的脱漏与疑问，还望方家不吝赐教。另外，本书对于《楞严经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半部分的义理方面，对于后半部分的修行方面只是略有涉及，而我对“观音法门”、“破五阴”等传世精要亦非常感兴趣，希望能尽快做出系统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大众。

博士论文的完成与本书的付梓离不开诸多上善因缘的和合。在此特别感谢楼师宇烈先生，先生以高旷豁达的人格、澄明圆彻的睿智给予我精神和学识方面的指导。感谢父母多年以来的照料，当许多朋友都忙于生计时，我还能享受校园生活，自由地探索生命与学术，这都要归功于双亲的付出与包容。感谢我的夫人江宁，她在心灵上的鼓励和工作、生活中的扶持，使我得以不断精进。感谢出版社的张红老师，她认真的精神与诚恳的态度非常值得我学习。感谢一切或直接、或间接帮助过我的有情大众！最后，感谢阅读、参考过的所有文献的编著者，谨向一切传播智慧之光、延续文明火种的师长们，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！

苏磊

2012年10月30日

于哈尔滨龙之港寓所

目 录

导言	(1)
一	《楞严经》的历史地位与疑伪问题 (1)
二	作为争议中心的如来藏 (10)
三	本书所关注的问题 (16)
四	本书的结构与基本内容 (22)
第一章	真常心与如来藏 (29)
一	“大佛顶首楞严” (29)
二	“常住真心性净明体” (33)
三	“真如” (37)
四	“两种根本” (40)
第二章	本觉与如来藏 (48)
一	“识精元明” (48)
二	从识心到本觉 (52)
三	阿赖耶识与如来藏 (67)
四	交通性相的本觉 (78)
第三章	显现与如来藏 (83)
一	“妙觉明体” (83)



二	从妄无到真际	(87)
三	轮回显现的显密说明	(104)
四	如来藏缘起论简析	(115)
第四章	不二与如来藏	(122)
一	“即非”不二	(122)
二	不可思议的法界缘起	(125)
三	妄真双运自解脱	(139)
四	超越言说相	(150)
五	显密教法之别	(158)
第五章	《楞严经》的修行实践	(169)
一	“最初方便”的修行指导	(169)
二	“观音法门”与修证次第	(179)
第六章	其他如来藏经典之思想侧重	(190)
	结语	(208)
	参考文献	(215)

导　　言

一 《楞严经》的历史地位与疑伪问题

《楞严经》全称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》，是唐代中叶译出的一部大乘经典，本经译出后即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，教界共许《楞严经》为“佛教修行大全”：在义理上，阐释了如来藏思想；在内容上，涵摄禅、净、密、律；在修行上，举凡发心、解、行、证，皆详尽剖析——从教令正发心起，破惑、见真、依性起修，详细开示了二十五位圆通法门和三界七趣等圣凡境界；在道次第上，历数三渐次、乾慧、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四加行、十地、等觉妙觉等趣向；更明示实修实证中的五十种阴魔境界及防护之法，令行人能够克服障难，圆满成就。

《楞严经》之于中国佛教的地位是十分崇高的，它与《金刚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一样，受到僧俗二众的普遍重视，许多寺庙都以讽诵此经为主题举办“楞严法



会”；自明清以来，僧人们的早课均要背诵经中那长达两千六百余字的“楞严咒”；对于历代佛教学者而言，疏解《楞严经》是其毕生最重要的弘法事业之一，明末清初著名佛教学者钱谦益所著的《楞严蒙抄》“古今疏解品目”中，所录历代注疏多达 40 余种，再加上清代迄今的著作，总数要在 60 种以上，大乘经典中只有极少数的如《金刚经》、《法华经》等可与之相比。教界的高僧耆宿对《楞严经》的推崇众口一词，认为本经“一乘终实，圆顿指归。语解悟，则密因本具，非假外求；语修证，则了义妙门，不劳肯綮。十方如来得成菩提之要道，无有越于斯门者矣”^①。明末四大高僧均注疏《楞严》，藕益智旭在《阅藏知津》中称本经是“宗教司南，性相总要，一代法门之精髓，成佛作祖之正印也”^②。近代推动佛教复兴的杨文会居士，步入佛门是受《楞严经》影响；再兴天台的名僧谛闲，在其一生所讲的经论中，以《法华经》和《楞严经》为最多；太虚大师对《楞严经》也是推崇有加，著述有《大佛顶首楞严经摄论》及《楞严研究》等。

在历史上，《楞严经》还以“圣言辞义双妙，首尾照应，脉络贯通”^③而受到文人居士的青睐，视之为内典中的文学瑰宝，深契佛理的宋代名臣王安石曾著《首楞严

① 真鉴：《首楞严经正脉疏》“序”，佛陀教育基金会，第 4 页。

② 智旭：《阅藏知津》卷十一，线装书局 2001 年版，第 131 页。

③ 真鉴：《首楞严经正脉疏》卷七，佛陀教育基金会，第 179 页。



疏义》，张商英亦撰有《楞严海眼》。对于《楞严经》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关系，“早就有人提到，如李屏山《鸣道集》卷2中就说‘程子之说，几于道矣。全出《楞严》《圆觉》之书。’钱谦益《蒙钞》卷五末所收资料中，就有提到程明道、陈白沙、罗近溪等与《楞严》的关系”^①。明中叶以后，中国思想史迈向了“佛教复兴运动”的新时期，在此期间《楞严经》受到了儒、佛学者的高度重视，日本学者荒木见悟认为，随着对朱子学的反省和阳明学的发展，“佛教与阳明学相互补助的路打开了”^②，而《楞严经》作为一部以探讨心性见长的佛教经典，更为广泛深入地与儒家心学发生了联系。

综上所述，不难看出《楞严经》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力，然而，这样一部被教界奉为至宝的经典，却鲜少为当代大陆学者研究或用作引证资料^③，或许是由于此经一直存有“真伪之争”的缘故。实际上，从北宋的《开

^① 参见龚隽《宋明楞严学与中国佛教的正统性——以天台、华严〈楞严经〉疏为中心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2008年第3期，第38页注释3，其中还提及日本学者荒木见悟、久须本文、太田锦城对此问题的研究情况。

^② 荒木见悟：《明代楞严经的流行》（下），台北《人生杂志》1994年第125期，第33页。

^③ 《楞严经》在台湾地区的研究情况较好，自1963年至2006年，作为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约有10篇，其中博士论文1篇，其余为硕士论文，内容涉及“真心思想”、“身心关系”、“缘起论”、“耳根圆修”、“解脱道”等诸多方面。参见《佛教相关博硕士论文提要汇编》，香光书乡出版社。



宝藏》到清代的《龙藏》，《楞严经》一直是被作为“正藏”的内容由历代刊行的一切版本的大藏经所收录，能作为佛教的重要典籍被收载于最具权威性的大藏经中，应该说它的真实性是不成问题的。

关于《楞严经》是伪经的议论，“在唐代就已有之，但并不见于唐人的著作，其情况仅有来自日本的材料”^①，“唐代关于《楞严经》是伪经的议论只是个别现象，并没有在中国僧界形成气候，也没有影响《楞严经》的流传”^②。直至清末民初，《楞严经》的疑伪问题才又被提了起来，其中批判最激烈者当属梁启超和吕澂，梁启超说：“《楞严经》可笑的思想更多，充满了‘长生’‘神仙’的荒诞话头，显然是受了道教的暗示，剽窃佛教的皮毛而成。……真正佛经并没有《楞严经》一类的话，可知《楞严经》是假书”^③，吕澂则认为《楞严经》是“集伪

① 参见李富华《关于〈楞严经〉的几个问题》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1996年第3期，文称：据日本僧人玄叡所著《大乘三论大义钞》（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第七十五册）记载，此经在翻成汉文后不久即传入日本，但引起“众师竞争”，后遭德清法师等到中国考察，从唐居士法祥口中得知：“大佛顶经是房融伪造，非真佛经也，智升未详，缪编正录”；另一位日本僧人戒明亦曾在唐代宗大历年间（766—779）入唐，也曾听到关于《楞严经》是伪经的议论（小野玄妙：《佛教经典总论》135页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）。

② 李富华：《关于〈楞严经〉的几个问题》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1996年第3期，第77页。

③ 梁启超：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“总论”，载于《梁启超全集》第十七卷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5036页。



说之大成，盖以文辞纤巧，释义模棱，与此土民性喜鹜虚浮者适合”^①，于是作《楞严百伪》，提出了证伪本经的101条根据。

平允而言，本经的传译情况确实存有一些疑问。唐代著名佛经目录学家智升在《续古今译经图记》中记载，“般刺蜜帝……于广州制旨道场居止。……以神龙元年龙集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丑，遂于灌顶部中诵出一品，名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》一部（十卷），乌苌国沙门弥迦释迦译语，菩萨戒弟子前正谏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受，循州罗浮山南楼寺沙门怀迪证译”^②；而智升在《开元释教录》中，记录此经是怀迪所译，“往者三藏菩提流志译《宝积经》，远召迪来以充证义，所为事毕还归故乡。后因游广府遇一梵僧（未得其名），赍梵经一夹请共译之，勒成十卷，即《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》是也。迪笔受经旨兼缉缀文理。其梵僧传经事毕，莫知所之。有因南使流经至此”^③。《续译经图记》与《开元释教录》同为智升于开元十八年（730）所著而所记不同，难免令人对本经的译时译者抱

^① 吕澂：《楞严百伪》，载于《吕澂佛学论著选集》（一），齐鲁书社1991年版，第370页。

^② 智升：《续古今译经图记》，大正藏五十五册，第371页下—372页上。

^③ 智升：《开元释教录》卷九（总括群经录上之九）大正藏五十五册，第571页下。



有疑问^①。本经的流传情况也颇为曲折，据称本经译成之后，“房融入奏，又遇中宗初嗣，未暇宣布，目录阙书。时禅学者因内道场得本传写，好而秘之，遂流此地。大通（神秀）在内，亲遇奏经，又写随身，归荊州度门寺。有魏北馆陶沙门惠振，搜访灵迹，常慕此经，于度门寺遂遇此本，初得科判”^②。“唯憲……受旧相房公融宅请，未饭之前，宅中出经函云：‘相公在南海知南詮，預其翻經，躬亲筆受《首楞嚴經》一部，留家供養。今筵中正有十

① 如《楞严百伪》提出“房融笔受”事存疑，《续译经图记》记载此经是神龙元年五月译出，房融笔受，根据《旧唐书》，房融是神龙元年二月被流放到高州（今广东高县），吕澂认为京师至广东数千里，房融不大可能在两三个月内到达，并在广州从容参加译经；不过有许多文人诗文、地方志及佛教史书记录房融笔受事，故可信度较大（参考罗香林：《唐相国房融在光孝寺笔受首楞严经翻译问题》，张曼涛主编《现代佛教学术丛刊》第35册，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，第324页）。另有“怀迪证译”事存疑，《开元录》记载怀迪是先参加《大宝积经》的翻译，之后才到广州参加《楞严经》翻译的，这与另一条记录矛盾，《开元录》卷九说，菩提流志于神龙二年（706）开始编译《大宝积经》，于先天二年（713）完成。这样，怀迪参与译《楞严》应在译《宝积》之前，同是《开元录》则说是在后，并且《开元录》与《续译经图记》中的记载也不同；对此，杨维中认为两种说法是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的，有可能是智升撰写经录时（著《开元录》在前）得到的材料有先后简繁之别，但得到新材料后智升并未修改前说，一是可能智升认为“怀迪译”不算错，因为他的贡献最大，二是《开元录》完成后即进献给朝廷，也不便修改，（参见杨维中《论〈楞严经〉的真伪之争及其佛学思想》，《宗教学研究》2001年第1期，第60页）。

② 子璇：《首楞严义疏注经》卷一，大正藏三十九册，第825页下。